

程。赵文润、赵君伟合著的《渤海郡王大祚荣传奇》(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采用章回体小说的形式,叙述了渤海开国之君大祚荣的传奇故事,形象地揭开了渤海国早期神秘的面纱,勾勒了渤海与大唐的手足关系,表现了民族大统一的深刻主题。上述文学作品,成为普及渤海史知识的新形式。

综观21世纪以来出版的中国渤海史研究新著作,笔者认为其足以反映出中国学术界渤海史研究的最新成就和整体水平,具有以下几个突出的特点:一是通史研究更加深入;二是专题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三是考古调查与研究成果丰硕;四是更加重视文献资料的搜集与整理;五是论文集的数量大幅增加;六是渤海历史知识的普及成为专家学者及普通百姓所关注的新热点。当然,中国渤海史研究也还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如国外学术界的很多重要学术著作尚未翻译成中文,限制了中国学者对国外学术观点的了解,也不利于对外学术交流的开展;又如,渤海史的一些专题,如经济、社会生活、科技等方面,还期待着新的精品力作问世,这些都将成为中国渤海史研究今后努力的方向。

由于笔者学识水平及资料来源所限,本文所介绍的渤海史研究新著难免存在挂一漏万、分类或取舍详略不当等瑕疵,敬请广大读者见谅!

近六十年宋辽西夏金火葬研究综述与反思

马强才 姚永辉

(杭州师范大学国学研究院 浙江杭州 310036)

20世纪50年代,随着各地宋辽西夏金火葬墓被不断发掘,徐苹芳等学者率先对宋元火葬展开专门研究,六七十年代,日本、美国学者也屡有成果问世。八九十年代以来,随着学科之间的交流与碰撞日益频繁,社会文化史等领域的研究视角和方法发生了较大转变,这推动了学界对宋辽西夏金火葬习俗的研究,在仪式和墓葬特征、区域分布、社会经济文化与宗教信仰、国家制度与思想观念、文学艺术等方面多有斩获。据笔者统计,近60年来,火葬墓专题考古报告就有百余篇(部分未公开发表的报告不计其内),中外学界以火葬为主题的论文约有60余篇,现择其要者,综述如下:

仪式和墓葬特征。学界对火葬仪式和墓葬特征的研究,较为偏重后者。徐苹芳《宋元时代的火葬》(《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9期)是首篇综合文献资料和20世纪50年代的考古成果撰写而成的宋元火葬专题论文,该文利用《马可·波罗行记》中关于敦煌、杭州居民火焚仪式的记录,以及当时的传统史料、笔记小说等文献,勾勒出土宋辽金元时期火葬仪式的基本面貌,如使用偶像崇拜,作丧歌,焚烧纸制马、骆驼、钱币等。此外,该文还依据火葬使用者、骨灰处置

方式和墓葬形制将火葬分为两类,并针对不同地域,分析其形成原因,学界此后的研究多承袭其观点。随后,日本学者牧尾良海在《宋代的火葬习俗》(《智山学报》1968年第3期)中也论述了火葬的葬埋方式,大致观点与徐文相类。霍巍《宋元时期的敦煌葬俗——〈马可波罗游记〉中的一段史料》(《敦煌研究》1990年第1期)更为细致地分析了敦煌的火葬仪式。徐吉军(《中国丧葬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在徐苹芳的基础上全面总结了宋代火葬对骨灰的处理方式,包括:焚尸后将骨灰放入木盒或陶罐,然后埋入墓中;尸体火化后,将骨灰存放于寺院、漏泽园,或家中,逢节祭奠;焚尸后将骨灰弃于野外或水中等。学界对宋辖区内火葬情况的研究主要见于各地考古报告,兹不赘述。特定区域内的讨论,如霍巍和黄伟所著《四川丧葬文化》(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之“宋火葬墓和火葬习俗的流行”、罗开玉《古代西南民族的火葬墓》(《四川文物》1991年第3期)、李爽《浅谈宋代河东火葬风俗》(《山西煤炭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9年第3期)等。部分墓葬综述也可重点参考,如刘志远、石坚《川西的小型宋墓》(《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9期)、王家祐《四川宋墓札记》(《考古》1959年第8期)、陈云洪《试论四川宋墓》(《四川文物》1999年第3期)、莫稚《深圳市考古重要发现》(《文物》1982年第7期)、黄宣佩《上海宋墓》(《考古》1962年第8期)、林钊《福建省四年来古墓葬清理简况》(《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1期)、郑东《福建厦门古墓葬考古综述》(《文物春秋》2002年第3期)等,另外秦大树《宋元明考古》(文物出版社2004年)、董新林《中国古代陵墓考古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中也有述及。

相比之下,辽金火葬的研究更盛(辽金火葬墓的出土数量远多于宋、西夏),尤其集中于对墓葬类型和随葬品特征的总结和分析。景爱的《辽金时代的火葬墓》(《东北历史与考古》第1辑,文物出版社1982年)是最重要的成果之一,文中详细分析了辽金火葬墓的主要类型、葬具葬式和随葬品,对宋元火葬墓也兼有论述。此外,杨晶在《辽代火葬墓》(《辽金史论集》第3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中展开分期研究,认为早期(辽建国初年至景宗乾亨末年)火葬墓较少,多竖穴土坑,且以陶罐盛放骨灰;中期(圣宗统和初年至兴宗重熙末年)数量增加,以砖(石)室墓为主,多圆形,流行仿木结构和壁画装饰,随葬以瓷器为主,一般有墓志,葬具多精美石棺;晚期(道宗清宁初年至辽末)数量最多,形制趋于复杂,有圆形、方形、梯形和多角形,随葬品有瓷器、陶器和铜钱等,另有经幢和净法界真言碑,葬具中还出现了骨灰槽以及真容偶像的木雕人等。除上述专题论文之外,其他关于辽墓的研究中也有述及,如王秋华《辽代墓葬分区与分期的初探》(《辽宁大学学报》1982年第3期)、徐苹芳《辽代墓葬》(载《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李逸友《辽代契丹人墓葬制度概说》(《内蒙古东部区考古学文化研究文集》,海洋出版社1991年)、宿白《宣化考古三题》(《文物》1998年第1期)、张国庆《石刻资料中的辽代丧葬习俗分析》(《民俗研究》2009年第1期)等。学界较少对金代火葬墓展开专题研究,秦大树《金墓概述》(《辽海文物学刊》1988年第2期)、李健才《金代女真墓葬的演变》(《辽金史论集》第4辑)、刘晓东等《试论金代女真贵族墓葬的类型及演变》(《辽海文物学刊》1991年第1期)从不同方面展开过论述。对特定地域的金墓研究,以赵永军、姜玉珂所撰《黑龙江地区金墓述略》(《边疆考古研究》第6辑)为代表,认为该地区早中期金墓多以瓮罐、木棺(槨)为葬具,中晚期则出现先以木匣盛敛骨灰、再以石函为葬具的埋葬形式。就西夏火葬墓而言,孙昌盛《略论西夏的墓葬形制和丧葬习俗》(《东南文化》2004年

第5期)对西夏火葬墓有较为集中的概括总结。此外,朱瑞熙、刘复生、张邦炜等所编《宋辽西夏金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对宋辽西夏金的火葬习俗分别作了简要梳理和分析,其内容还见于张邦炜《辽宋西夏金时期少数民族的丧葬习俗》(《四川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等单篇论文。

区域分布。徐苹芳《宋元时代的火葬》提到至20世纪50年代在东北、北京、山西、河南、福建、四川各地均发现火葬墓。伊沛霞(Ebrey)《宋代的火葬》(《美国历史评论》第95期第2号,1990年)基于文献和考古出土资料,粗略估计宋代火葬率在10%—30%之间,具体比例因不同的区域、时间和环境而上下波动。徐吉军在《中国丧葬史》中对宋代火葬盛行的地区有较为详细的总结,认为北宋时期,都城汴京和河东地区最盛,南宋火葬最盛区则是两浙,此外,福建、广东番禺、佛山、新州等地都风行火葬,江西、湖北、湖南等地也都有火葬的记载。景爱《辽金时代的火葬墓》分析辽金时代的火葬墓主要分布在北京、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山西和内蒙古等地,其中尤以东北地区为多。在俄罗斯境内,辽金火葬墓主要见于犹太自治州和哈巴罗夫边区等一些地方。杨晶《辽代火葬墓》认为在辽朝直接统治下的广大地区均有分布,其中以巴林左旗、宁城、朝阳、北京、大同等地尤为集中。

社会经济文化与宗教信仰。围绕着宋代火葬习俗,讨论最多的议题就是火葬为何盛行,主要观点约略有三:土狭民众,贫民受制于经济条件而不得不采用火葬;宗教信仰,尤其是佛教的影响;出于卫生的考虑等。徐苹芳在《宋元时代的火葬》中提出前两方面是造成火葬盛行的主要原因。黄敏枝的《中国的火葬习俗》(《中国史新论·傅乐成教授纪念论文集》,台湾学生书局1985年)也从经济和佛教等方面分析了民众使用火葬的原因。徐吉军在《中国丧葬史》中认为佛教世俗化、某些道士也乐于采用、少数民俗风俗的影响以及贫民无土、节约葬费等都是宋代火葬盛行的原因。徐吉军另有《论宋代火葬的盛行及其原因》(《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3期)、《论宋代两浙的火葬习俗》(《浙江民俗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等文,内容相类。王宇《佛教对宋朝火葬盛行的影响》(《佛学研究》2008年第2期)认为两宋时期火葬盛行,其根本原因是受到佛教的影响,凡是火葬盛行的地区,佛教都非常发达。冉万里在《宋代丧葬习俗中佛教因素的考古学观察》(《考古与文物》2009年第4期)中认为火葬虽然也曾在古代出现过,但没有成为丧葬的主要形式,而且主要是一些特殊死亡者使用,佛教传入之后,火葬才开始大量使用。张邦炜、张敏《两宋火葬何以蔚然成风》(《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2期)则认为火葬风俗的形成与信仰佛教并无必然联系,人多地少的矛盾以及火葬卫生节省、方便葬埋等优势才是关键原因。伊沛霞《宋代的火葬》认为风俗改变的前提是新的观念培植出新机构或者常规生活被打破,具体而言,即佛教寺庙进军殡葬业并向公众提供火葬服务以及九、十世纪的战争和移民迁徙等。其余如张永升《宋代丧葬礼俗之初探——火葬》(《国文学志》1999年第3期)、黄新宇《宋代火葬摭谈》(《文献》2000年第4期)、许周鹑《古代江南的火葬习俗》(《东南文化》1989年第2期)、张捷夫《我国历史上的火葬》(《光明日报》1996年1月23日)、王淡明《火葬话源》(《民俗研究》1986年第2期)等文也有相关论述,观点相类。另外,朱德明(《南宋时期浙江公共卫生治理及其卫生习俗》,《医学与社会》第18卷第5期)从卫生角度分析火葬虽然由于工具落后对周围的空气和水域等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环境污染,但毕竟是最妥善的使尸体无害化、无机化的方法,当时对患伤寒之类传染病而身亡者采用火葬,在预防传染

疾病传播扩散方面有积极意义。

对于辽代火葬习俗,讨论中心则是究竟是受佛教还是原始宗教的影响。冯家昇在《契丹祀天之俗与其宗教神话风俗之关系》(《史学年报》1卷4期,1932年)中提出契丹人实施火葬实乃受佛教的影响。景爱在《辽金时代的火葬墓》中分析不仅契丹人、女真人等少数民族实行火葬,部分汉族人也实行火葬,既有一般的平民百姓,同时还包括有许多官僚贵族,并提出辽金时代的火葬墓,首先是在契丹人、女真人中出现,而后影响到汉族人。契丹人实行火葬与认为火葬能保佑家族狩猎成功的原始信仰有关。宋德金(《辽金文化比较研究》,《北方论丛》2001年第1期)比较辽金的火葬习俗,综合上述两说,认为契丹、女真行火葬,是原始葬俗遗留和受佛教传播影响的结果,同时也有汉人和同时期宋人因受儒家观念影响较深,抵制火葬。杨晶提出对辽契丹人和汉人应区别分析,并作了较为深入的阐述,她在《辽代火葬墓》和《辽代汉人墓葬概述》(《文物春秋》1995年第2期)两文中认为,辽代火葬的流行是多方面作用的结果,虽然在契丹人和汉人中都有一定数量的火葬墓,但这两种火葬墓出现的原因并不相同,契丹人的火葬,可以视为原始葬俗的遗留,与佛教影响的关系似乎不大。因为在辽代佛教盛行的中晚期,极少发现契丹人,特别是笃信佛教的契丹贵族的火葬墓,表明随着契丹社会的发展,原始的火葬习俗已经衰退。而辽代汉人的火葬则与佛教影响有着密切联系,与辽地汉人心境的改变也有一定关系。霍杰娜(《辽墓中所见佛教因素》,《文物世界》2002年第3期)从出土的文字材料、壁画、葬具以及随葬品、墓葬形制等方面具体分析了辽墓中的佛教因素。对于金代火葬习俗,争议较少。庞志国在《略论东北地方金代石函葬》(《黑龙江文物丛刊》1984年第4期)中认为石函葬在金代的兴起与佛教兴盛密不可分,并分析了石函葬在东北地区女真人中流行的文化渊源。赵永军、姜玉珂(《黑龙江地区金墓述略》)通过对黑龙江地区金火葬墓的分析,也认为金火葬的增多,恰与佛教、道教等的传播、推广是相一致的。由僧人的舍利函演变而来的石函作为葬具出现,直接推动了火葬的流行,尤其是在社会上层中的丧葬变革。黄登民、李云凯、徐凤媛的《金代女真人火葬墓流行原因初探》(《黑龙江民族丛刊》1995年第1期)是比较集中地分析金代火葬习俗流行之因的论文,认为除佛教作用之外(尤其到了正隆、大定时,随着女真人汉化的加深,佛教的流行,埋葬习俗也由土葬发展到火葬),还包括其他诸如频繁的迁移、辽代火葬习俗的影响、不正常死亡等其他社会经济文化方面的原因。针对西夏崇奉佛教导致火葬盛行的说法,孙昌盛在《略论西夏的墓葬形制和丧葬习俗》中提出异议,认为主要因为火葬是西北少数民族的原始葬俗和土狭民众的客观需要等。

国家制度与思想观念。徐吉军在《中国丧葬史》中概括了宋代统治者对火葬的政策措施,包括严火葬之禁、载入刑律绳之以法、设置漏泽园或义冢遏制火葬等。张邦炜在《两宋时期的义冢制度》(《天府新论》1995年第9期)中指出宋代的义冢制度是以革除火葬为最终目的。徐苹芳在《宋元时代的火葬》中认为虽然宋政府禁止使用火葬,但在土地问题未得到解决之前,难以禁止贫民火葬,而豪富士族要用火葬,禁令对他们也不生效力。游彪《“礼”“俗”之际——宋代丧葬礼俗及其特征》(《云南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以反对火葬、风水等为例,认为宋廷多依据儒家的伦理道德来规范世人的言行,但现实生活中,俗的力量非常强大,且有根深蒂固的存在基础,二者在矛盾和相互协调的过程中各自发挥其相应的功能。庄晓苑在《论风俗与国家权力和宗教信仰之关系——以火葬为例》(《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2008年第4

期)中揭示了风俗与国家权力和宗教信仰之间的关系,分析了国家禁令和知识分子的奋争对火葬的影响程度,认为风俗的改变根源于人们宗教信仰的变化,仅凭国家力量的强制推行是无法实现的。刘春德的《宋代火葬的盛行及其对“华夷之辨”观念的挑战》(《广西右江民族师专学报》2005年第5期)从思想史角度分析了宋代火葬习俗屡禁不止的原因,认为火葬与反火葬之争,其实是挑战与维护“华夷之辨”观念的一个缩影,挑战一方获胜和维护一方的受挫,这是作为“华夷之辨”观念维护者的宋代儒家学说影响力式微,而作为挑战一方的佛教和少数民族丧葬观念强势影响中原文化,以及宋代特殊的时代特征交织作用的结果。陈小锦《火葬与社会文明的进化——兼论宋代火葬》(《广西师院学报》1996年第1期)从火葬流变,特别是宋元时期由极盛而转衰以及火葬与社会文明进步等三方面的考察,说明了火葬的历史必然性。孙昌盛《略论西夏的墓葬形制和丧葬习俗》引用西夏法典,指出西夏政府与唐宋政府的态度截然不同,他们并不反对火葬。事实上,辽金亦是如此。

文学艺术。吴晟在《宋元戏曲中的婚丧习俗》(《贵州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中概括了如《小孙屠》等宋元戏曲中的火葬习俗,另有王丹《从宋人笔记小说探看宋代城市丧葬文化的若干新取向》(《语文学刊》高教版2006年第11期)等。此外,火葬墓出土的装盛骨灰的陶罐、陶棺的式样和纹饰也是艺术史研究中的关注对象。

总体而言,近60年来,学界虽对宋辽西夏金火葬习俗的研究已取得上述诸多方面的成果,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尤其是近两年宋代火葬的研究论文,较之辽金火葬的研究,多因承前人,缺乏创新。笔者不揣浅陋,提出如下四点反思或展望:其一,习俗的流行区域未必与政权辖区相重合,习俗的历时性演变也未必与政权更迭同步,因此,对宋代火葬的研究,如果只以宋辖区域和时代为观照对象,可能导致对火葬流行区域、原因以及历时演变做出错误的判断。其二,我们既要注意丧和葬的区别,即前者重仪式,后者重墓葬,同时也要看到两者相互印证或相反的一面。仪式可为墓葬分析提供更多思考的方向,而墓葬(如形制、葬具、随葬品等)也可帮助我们还原仪式中某些被遮蔽的部分。就这点而言,沈睿文《重读安菩墓》,《故宫博物院院刊》2009年第4期)对唐安菩墓的分析颇具启发意义,他通过多种文本、丧葬分列的参互式解读,揭示了仕唐的昭武九姓族群深具外圆内方的一面。因此,在非汉族民族政权统治的区域,对于汉人和其他族群的火葬同异要作更为细致的分析,异文化之间的关系表现于特定使用者身上,往往是多方面着力的结果,不能仅凭一两点就盖棺定论,警惕在“汉化”或“非汉化”的绝对区分下作简单分析。其三,在火葬盛行之因的讨论中,应重新检视古人的一些“经典之论”,尤其要注重考察能够支持它成立的时间、空间的有效性。另外,对某些既有研究也要仔细审视,而非直接搬用,比如伊沛霞对宋代火葬率在10%—30%之间浮动的数据估算,从发表时间看,所依据的最多也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前的考古材料,而文中对南宋四川成都周边的火葬率高达80%的估算,所依据的也仅仅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考古成果。研究者在利用这些数据的时候,多未注意到其估算的依据。其四,对国家禁止火葬的研究,应该突破禁令的罗列梳理,可给予实践层面,如地方官的运作以更多的观照。